

关注“遗产再利用”

“再利用”让建筑遗产恢复尊严

——澳门望德堂坊BL.9地段建筑的更新再利用

本报记者 李佳霖

它是一座有百年历史的城市集合住宅建筑,在30多年历史变迁中,几次险遭拆除。直至2005年,它才被“再利用”为澳门演艺学院音乐学校新校区。它就是澳门望德堂坊BL.9地段建筑。

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望德堂坊BL.9地段是由和隆街27号至35号及疯堂新街28号至36号的10个相连建筑组成的完整街区。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现行文物保护法令,此街区属于已经认定的望德堂坊建筑群的一部分。

早在20世纪初,望德堂坊建筑群的街区布局规划已经形成,其内除望德圣母教堂、学校、医院、安老院和宗教服务设施外,还修建了不同类型的住宅,其中一梯一户的准集合住宅比较多。BL.9建筑是这些准集合住宅中的一组。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相邻其他街区中各自独立的建筑单元被大量拆建成五六层高的现代集合住宅楼,BL.9建筑就成了望德堂坊内准集合住宅中保存相对完整的一组。

BL.9建筑是长约55米、宽约25米的矩形街区。由10个方形平面的建筑单元组成,每五个连成一排,背对背地分列于两条互相平行的街道——和隆街和疯堂新街。在两排建筑之间,又设有一条两米宽的小巷,把各建筑单元的天井串连起来,小巷端头有出入口通往街区两旁的斜路——疯堂斜巷和疯堂中斜巷。“每个建筑单元宽三间,深两进,呈凹字形平面,高两层,平均沿街高9米。平面布局前部生活区和后部服务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文化财产厅建筑师陈建成介绍,生活区以楼梯为中心,入口正门、一楼饭厅和起居室、二楼卧室和浴室都围绕楼梯设置。天井是服务区的中心,挖有食水井,设石台阶和后门出入街区内部的公共小巷,厨房和佣人房分置天井两旁。

“BL.9地段建筑的价值虽不高,但它作为现存的该街区和周边街区内城市居住建筑的典型,对研究和了解当时望德堂坊市民的生活方式和邻里关系有着显著的人文价值。”陈建成说。

蹒跚的“活化”历程

1976年,澳门颁布的文物保护法令——第34/76/M号法令中指明具有公共利益的“组成代表澳门历史文物的

都市综合区”在未获“维护澳门都市、风景及文化财产委员会”同意前,应维持现有面貌,不得改变。望德堂坊被列入该都市综合区的清单内。

然而,1981年,BL.9建筑的业权人获得了当时行政当局批准的有关发展计划,将其进行了拆除。拆除行为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促使澳葡政府对其紧急叫停。遗憾的是,和隆街33号和35号已经被拆。这起“文保”事件促使澳葡政府在1982年成立了澳门文化学会,设立文化财产办公室,专门负责文物保护相关工作,并在1984年颁布了新的文物保护法令,即第56/84/M号法令。

澳门文化学会成立后,当地政府立即与BL.9建筑的业权人洽谈购买相关业权,直到1994年,才成功以换地的方式取得该地业权。但5年后,BL.9建筑才正式纳入澳门特区政府财产。在这期间,和隆街27号和疯堂新街28号因屋顶塌落被列作危楼而遭拆除。

之后,BL.9建筑的“再利用”被提上日程。当局计划将其改建成身份证明司大楼,1997年,文化司署在搬迁总部时,也曾经考虑使用BL.9建筑,2001年至2004年期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曾经打算将其改建为艺术活动中心或小型音乐厅,但都因种种原因没有付诸实施。

2005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终于沿用过去数年面对空置文物建筑时使用的“先保护,后利用”策略,开始对BL.9地段建筑留存下来的6个建筑单元,即和隆街29号、31号及疯堂新街30号至36号进行修复。陈建成介绍,修复工作在2006年完成后,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提出将该建筑物利用为澳门演艺学院音乐学校的临时校区,计划获批后,BL.9建筑成为澳门演艺学院音乐学校新校区。

“2008年澳门演艺学院音乐学校迁入后,BL.9建筑不只给学校带来独特的建筑形象,也为学生提供了层次丰富的空间环境,有利于艺术触觉的培养。”陈建成说,此外,由于看到政府在该街区的积极投入,望德堂坊原有坍塌和荒废多年的建筑也陆续被利用起来,空置的商铺逐渐减少,慢慢改变了沉寂没落的街区氛围。

最少介入、识别性和可逆性

“澳门现在的城市景象、建筑之间



2011年的BL.9建筑 图片由澳门文化局文化财产厅提供

几乎不存在任何对话,这是造成城市景观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在BL.9地段‘再利用’过程中,我们利用修复契机,做一些设计来协调现有周边环境,同时思考望德堂坊的城市设计。”陈建成说,比如和隆街35号所处十字路口的另外两个街角,分别是荷兰园商业中心和清安医所门诊部,两者在立面上设有阳台,从街道景观考虑,这些阳台需要有足够的视觉空间或景观物来呼应或对话,因此我们把拆空的30年的和隆街35号改造成开放式花园,作为BL.9建筑的主人空间,通过三者产生的视觉联系,让这里变成视线停留、游走和交流的场所。在花园内,种植了一棵羊蹄甲,用来呼应街道上端。通过这样的内在联系,强化望德堂坊已经评定的建筑群的整体性,为保护工作带来实质效果。

“文物修复中普遍使用的原则,即最少介入原则,识别性原则和可逆性原则,是我们一直努力贯彻的原则。”陈建成表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铺砌的普通纸皮石地板仍然留在某个大房间内;其他表面破损的彩色水泥花砖地板,虽然已经没有任何光鲜的装潢效果了,但是经过简单清洗后仍然继续使用;天井内已经盖封的水井被重新打开,改造为水景设施,小小的储水池则改作鱼池使

用,为建筑注入鲜活气息……

建筑修复中,更新的部分要求必须做到与旧有建筑相协调,其他构造物如雨棚、扶手等,都尝试通过材料和设计操作,强化其可识别性,并强调它们临时和异质的性质。

“可逆性原则也是我们一直坚持的。”陈建成说,原来小巷地台的铺地是不规则小块麻石拼砌的当地传统“石仔路”,这种昔日遍及澳门大街小巷的铺地,现在已经所剩无几,我们在更新计划中努力把它们修复过来,期望人们走过凹凸的路面时可以真切感受到前年生活的空间,理解历史建筑的时代变化。但最终还是无法抵挡穿着高跟鞋的女性家长和教师的抱怨和要求。然而,我们没有把这条“石仔路”拆走,而是使用可逆性方法,把石板平铺在它上面,而且坚持在人员走动不多的小巷前端把它露出来,让人们知道它的存在。

“总的来说,在进行场所解读和开展更新设计前,建筑师必须约束个人的创作欲望,制约亢奋的设计权力,同时要明确‘再利用’的目的是发掘历史建筑在今天的价值、提升其环境的整体性和协调性。”陈建成强调,“再利用”的对象应该是受保护对象,是真正的弱者,脆弱得可能随时都会消逝,我们必须投以人道主义关怀,恢复它们应有的尊严。

消息长廊

浙江余姚:考古现场经受洪水考验

据新华社消息 浙江省余姚市在“菲特”台风带来的特大暴雨中损失严重,洪水淹城。著名的河姆渡遗址同样经历了这场洪水的考验。

经过两次科学发掘后,河姆渡遗址已经回填,目前正在开展河姆渡文化考古工作的是与它相距约7公里、位于东北方向的田螺山遗址。该遗址距今有5500年至7000年的历史,2001年被打井人发现,2004年起正式发掘,发掘结束后,建设成田螺山遗址现场馆。受“菲特”的侵袭,该场馆有所损失。考古领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平指着屋顶告诉记者,有一处彩钢瓦被大风吹开了,当地有关部门已经着手整修。

余姚平原地区海拔在2米左右,地下水位线是海拔1米左右,目前,场馆周围的稻田水位比场馆地面还高。记者看到,3米多深、1000多平方米的考古基坑里充满积水,最深处约有1米,其中矗立着大量干栏式建筑残存的木柱,侧面看上去就像是一片水上的树林。

孙国平说,由于地下水位高,坑中渗水常年不断,他们时常要开抽水泵排水。特别是“菲特”带来的暴雨加大了渗水,如果不是水泵抽水,

整个大坑都要被淹平了。

事实上,一定的地下水位可以隔绝空气,保存有机质文物。孙国平说,这就是田螺山遗址在同时期的新石器考古遗址中,保存的有机质文物最多的原因,之前的河姆渡遗址考古也同樣得益于此。平时他们还要保持适当水位,并给暴露在空气中的木柱浇水,保证它们的湿度。因此,只要水泵能够正常开动,外面的渗水对于考古工作并无大碍。

但是渗水加剧,也导致基坑边缘出现了局部坍塌的现象。特别是在西南一角,渗水就像泉水一样涌出来,一大片泥土坍塌下来。不过,意外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坍塌部位发现了一根新出露的大木桩。当时他们发现的最大的木桩有2.6米高,0.6米见方,从外观上看,这根“新家伙”也并不逊色。

远古时期的余姚人同样要与洪水奋斗。孙国平说,田螺山遗址实质是一个3万多平方米的远古村落,在它的晚期经历了持续几百年的水位上升过程,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明显的洪水沉积层。整个河姆渡文化的衰落与5000年前的大水灾有关,人水之间的矛盾当时就有了。(冯源)

西安咸阳发现163座战国及秦代平民墓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赵建兰)

陕西西安咸阳的周陵镇,早在上世纪,就已经发现有战国秦代君王的陵墓,而最近,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获悉,这里又发现了163座保存完整的战国秦墓。根据墓葬的形制特点,考古专家初步判定,该墓葬的年代为战国晚期偏晚至秦代,墓葬主人的身份应属于平民阶层,这为研究了解当时秦人社会结构提供了珍贵资料。

为配合陕西恒盛预制管桩(恒盛)和凝远水泥生产基地(凝远)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2012年9月至2013年2月对周陵镇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现的墓葬群,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周陵镇何家村北,东南距秦咸阳城遗址直线距离7.5公里,西距两座“周陵”1.7公里。主要以小型墓葬为主,大部分为竖穴墓道直线条洞室墓。一些墓葬中还出土了包括鼎、盒、壶和釜、盆、罐等常见的陶器,部分陶器上还戳印有文字,可见有“咸口里口”“咸亨口里口”等,考古专家据此推测,这批墓地应与咸阳城居民有关。而在其中一座墓中,墓主人骸骨和骹骨嵌有箭镞,专家推断应死于箭伤,也可能是为国

家服役的平民。

让考古人员不解的是,这批墓葬的发掘区域,位于此前发掘的“周陵”(秦人墓葬)和司家庄秦陵两座王(公)陵中间,也就是说,很多不同年代的后人墓葬和前人墓葬都葬在相同的地点,可谓是墓葬中套墓葬,考古专家说这就是考古意义上的“打破关系”,而这批墓葬中的“打破关系”似乎是故意为之,为何要将后人的墓葬故意葬在前人“领域”?随着对墓葬年代、墓主性别、墓主之间关系以及对整个墓地的进一步考古发掘,专家期望能找到答案。

此外,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条与墓葬同一时期的道路,为东北至西南方向,宽约10.4米左右,路两侧各有一排水沟,路路面厚5厘米至6厘米,上有车辙痕迹,部分车辙有叠加。道路可作为墓地的“自然”界线,对研究墓地的布局、结构、形成等具有重要的作用。而车辙的发现,则为研究先秦丧葬或秦交通提供了实物资料。下一步,考古学家拟对道路进行钻探,考察秦咸阳城遗址和墓葬区能否通过这条道路连接起来,从而进一步证实这批墓葬与秦都咸阳的关系。

呼伦贝尔发现一批东汉晚期文物

本报讯 近日,文物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境内发现一批东汉晚期文物。据专家介绍,这些陶罐、金饰件、耳环、串珠等文物属于同一墓坑殉葬品。

当地考古工作者介绍,人面双马纹金饰属于典型的游牧民族饰物,从金饰的形状来看,人面为鲜卑典型尖头、大眼、阔嘴,抽象而传神,与马的具象形成强烈反差。背面整体看呈虎头纹,似有匈奴遗风。

据了解,人面双马纹金饰为中国东北地区首次发现,对于蒙古族源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物考古价值。(梦文)

与古建园林氛围相契合

——恭王府遗址博物馆展览模式

刘立明

“情境艺术”的策展理念

“情”即展览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境”即恭王府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古建园林环境及其所传达出的意境。就举办展览而言,无论在建筑风格、园林环境、文化内涵还是观众数量方面,恭王府都拥有传统美术馆和其他常规展览场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作为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王府之一,恭王府是“可望”“可游”又“可居”的艺术空间。在这样一座凝聚着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史诗般的园林建筑中举办展览,更能促使观者形成身临其境的感受,以新的感知领会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精神,唤起人们对当代的生活方式、审美观念和趣味的重新思考。

“策展人”负责制模式

2013年是恭王府艺术系列展全面开花的一年。全年40个展览平均两周更换一次,嘉乐堂、安善堂、乐道堂及抱厦4个展厅同期使用。如此高密度的展览对策展人提出更高的要求。于是,恭王府艺术系列展实行了策展人负责制,以每个展览为单元成立展览小组,以展陈部成员为策展人担任组长,共同完成展览的策划实施。

翰墨丹青比翼齐飞——展览形式内容多样化

作为一座王府文化博物馆,恭王府先后举办了多场文物展。包括全面开放一周文物特展、梅兰芳纪念馆馆藏文物精品展、伯明翰藏明式家具展以及近期正在筹备的海关文物展。其中,海

关文物展展示的是北京海关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缉私成果,文物数量庞大,约有万余件套,品种丰富,包括书画、瓷器、家具、钱币、青铜器、佛像等多种类,其中不乏精品文物,经国家文物局有关专家鉴定,有的可为国家二级文物,甚至国家一级文物。这批文物(艺术品)已划拨给恭王府,填补了恭王府复原陈列及情境展览的空白。

恭王府遗址博物馆还举办了一系列艺术展,包括河南禹州晋家钧瓷作品展、李岚清篆刻艺术展、史习平篆刻展、丹麦王妃服饰展、金石藏展、古玉展、瓷艺展、紫砂艺术展、青海唐卡展等。

近年来,恭王府对外展览交流活动也在逐渐增加。摸索出根据不同的展览形式、展览受众、展示效果、展览方向,形成不同形式的展览(文物展、图片展、旅游推介展)的新模式,深受丹麦、德国、智利等国民众的喜爱。如:2013年8月,由波兰华沙瓦津博物馆、中波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彩灯文化节”暨“北京的恭王府图片展”在华沙皇家瓦津公园开幕后吸引了不少人前去参观。其中,北京的恭王府图片展通过方塘水榭、诗画舫、多福轩、妙香亭的图片呈现,让波兰民众及其他参观者近距离领略到恭王府建筑中彩绘、雕刻、宫门、匾字等所体现的深刻文化内涵。之后的8月29日,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举办了“2013恭王府论坛——贵胄风华:欧洲古堡群展”,集中展示了欧洲在古堡保护和综合利用方面的成果,他们有的利用废弃的城堡、修道院、教堂等古建筑,进行修缮和改造,建成古典绚丽、极具历史感的特色酒店供游客居住,既保留了历史遗迹,又获得了经济回报;有的利用宫殿或花园等世界文化

遗产的特点,将其打造成为极具吸引力的世界级的观光圣地,使游客在传统文化氛围中享受现代化的休闲设施。

量体裁衣——不同主题的专题展

恭王府还举办不同主题的专题展。2013年6月,在周汝昌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恭王府管理中心举办了周汝昌纪念馆筹建暨子女捐赠仪式。周汝昌先生是我国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书法家。他考证了《红楼梦》与恭王府的渊源,多年来对恭王府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支持。为研究展示周汝昌先生毕生的研究成果,保留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恭王府决定创办周汝昌纪念馆,向公众展示周汝昌先生不平凡的一生及其对国家和社会做出的贡献。经过多方努力争取、积极协调,周汝昌的家人决定将周汝昌先生生前的著作、手稿、墨迹、信札、收藏品等遗物捐赠给恭王府,作纪念馆展览、收藏之用。其中包括各个时期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书法手迹,与胡适、张伯苓等文化名人交往的信札手迹以及文玩收藏等。2013年8月,举办了“王府‘画’语”——李宏伟恭王府油画写生展。该展览收集了画家李宏伟用近3年时间特地为恭王府量身绘制的36件作品。

此外,恭王府还尝试举办多媒体艺术展。在架上绘画占主体的艺术系列展中,他们邀请了iPad绘画艺术家——吉林艺术学院教授董唯,利用iPad创作和表现生活。这种创作手段令人耳目一新,使展览更具普及性和参与度,也可以让观众与艺术家现场互动,激发热情。



卡帕多奇亚是土耳其最具游览价值的旅游景点之一。该地区集自然与人文景观于一体,既有仿月球表面的奇特岩石地貌,也有久负盛名的拜占庭风格的岩窟教堂和神秘的“地下城”。卡帕多奇亚最大的特点就是众多耸立在平地上形状奇特的小山峰,其外观如石笋、似烟囱,内部被掏空成为岩洞房屋。它们是由数百万年前3座火山喷发后散落的灰岩凝结,再经历数千年风化和湖水冲刷逐渐形成。位于德林库雷地区的“地下城”,始建于公元7世纪,是基督教徒为躲避战争及宗教迫害而修建。地下城在地面以下40米深处,地下约有18层至20层,目前只开放了8层。地下城中有1200多个房间,厨房、主室、畜舍、酒窖、教堂、神龛、储藏室等一应俱全,最多可藏身1万人。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格雷梅国家公园及卡帕多奇亚石窟群作为文化与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图为土耳其卡帕多奇亚的索布拉岩石峡谷风景区。新华社记者 卢哲摄